

| 中华学人丛书



权力与媒介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 马建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权力与媒介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 马建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马建标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4115-6

I. ①权… II. ①马… III. ①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874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 <http://xueda.bnup.com>

QUANLI YU MEIJIE: JINDAI ZHONGGUO DE
ZHENGZHI YU CHUANBO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王新焕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云虎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谨以本书纪念

先严马西荣(1937—2014)

先慈叶凤翠(1939—2014)

前言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①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传播是人类的本能活动之一，传播行为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在古代社会，人类过着群体生活，“依靠相互表达意向和情感，交流外界的信息”，在这个小群体内部，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互动。^②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庞大帝国之一，并以“中华帝国”之名享誉世界。而中华帝国赖以维系的重要凭借就是“传播”。^③纸张和印刷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这是古代社会非常伟大的两种“媒介技术的创新”。由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可以在庞大的帝国空间内进行大范围的传播活动，而且依靠纸张文字，解决了帝国文明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传播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华帝国在空间

①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5～36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②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详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上和时间上都得以最大限度地维系下来。^① 在中国古代，传播方式分为两种，即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其中，书面传播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而保存到今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文献”，而在当时还没有保留“声音”的技术，故而口头传播是无法进行跨时空的传递的。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传播网络，是遍布全国的“邮驿系统”。从先秦到晚清，驿站系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通信网络”。这一通信网络，主要服务于官方的文书传递。至于民间的书信传递，主要依靠私人捎带或派专人投送，当然也有人利用鸿雁、信鸽和家犬来进行传递。比如，《晋书·陆机传》就记载了陆机用家犬传书的故事。^② 到了清朝，官方的驿站邮递系统已经非常发达。清朝沿用明制，邮驿系统在中央由兵部管理，在地方由各州县管理。清朝皇帝发布的谕旨，分明谕和密谕两种，都是由邮驿系统发送到全国各地，其速度为每日300里至600里。这种公文信息传播，是封闭的，有等级的。至于民间书信传播，到明末清初时，已经出现了专营民间信息传递的“民信局”，专门负责传递私人书信、传递包裹等。^③ 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电报、铁路、邮轮等现代工业媒介技术的兴起，人类的传播手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无限加速，人们的世界观念以及权力运作方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媒介的诞生如何影响权力的运作，或者如何利用媒介传播以便更好地掌控权力，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权力与媒介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上述问题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

① 伊尼斯说：纸张与印刷术天生是为帝国的扩张服务的，因为“纸张与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而庞大的“空间”是帝国存在的基本标志。参见[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5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②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16～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当然属于中国近代传播史的范畴。不过，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本书虽然讲的是“媒介传播”，其实仍是一种“历史叙事”，也即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媒介与权力的变迁。简言之，拙著所探讨的媒介主要是指报纸、电报、记者、出版社、大学和通讯社等传播媒介。媒介不仅在传播知识，同时也会改变媒介受众的思想观念。随着近代媒介的传播，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形态、规模和速度上都将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规范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本书问题意识的形成，实际与笔者生命历程中的几个片段记忆有关。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笔者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去村里一位年长的老婆婆家中。老婆婆住在一个房门向西的土坯房里。她端坐在大桌子旁边，桌上点燃几支香。母亲和我跪在老婆婆的面前，只听见老婆婆口中念念有词，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很快就结束了。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只觉得很好玩。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在请村里这位“通灵”的老婆婆为我“叫魂”！然而，我当时清楚地记得，我和寻常相比，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的灵魂好好的。我更不知道，我是否曾经被什么东西给惊吓了。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受到了某种惊吓，为了保佑我的平安，才有这个“叫魂”之举。不管怎样，这件事成为我人生记忆的开始。

十几年后，笔者有幸进入安徽大学历史系读书，碰巧阅读了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清朝乾隆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叫魂故事，其大意是说：1768年，浙江湖州下辖的德清县县城东面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亟待重修。1月22日，由阮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佣的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班子开始修建工作，他们首先要打木桩入河。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截止到3月6日，木桩终于打入河底，吴石匠带领一班人等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工地上的米粮不够，于是赶回30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一个商业重镇塘栖

去采购米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他帮忙，为的是一件蹊跷吓人的事情。农民沈士良时年43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居住在同一个院落。这两个侄子为人刻薄暴戾，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沈某无处可以伸冤，只好求助于神秘的阴间力量。2月间，他听到过路人说德清县修建水门工程的消息。据他们说，石匠只要将写着活人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大锤击打木桩时，就会给往纸片上写名字的人增加某种精神的力量，这种法术称之为“叫魂”。名字被大锤击打的活人，就会因此被窃取精气，非病即亡。沈士良闻讯之后，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他痛恨的侄儿的名字。他找到了吴石匠，取出纸片交给石匠，还问：“这东西有用吗？你有这个法力吗？”然而，吴石匠什么也不会，他害怕自己因此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喊来当地的地保，将沈士良扭送进德清县监狱。阮知县审讯一番之后，发现是谣言，将沈士良打了25大板，就释放了。^①但是，这件事很快在浙江地区引发了有关“叫魂”妖术的恐慌，并进而波及全国。

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个“叫魂”案时，就立即联想到我在幼年时期的“叫魂”经历。从176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时隔200多年，其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那些在笔者童年时期生活着的皖北乡村的祖辈们与乾隆皇帝时期浙江湖州的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并无多大区别，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们都相信“叫魂”神秘力量的存在！这是何故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皖北村民依然在继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深度洗礼。虽然陈独秀、胡适等人在1915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范围其实仍局限在城市，中国广大的乡村仍然沉浸在19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信仰里。在接

^① 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5~9页，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受现代文明的程度上，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存在一个明显的时空错位。造成这种文明对立的因素固然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现代媒介的传播问题。笔者童年所生活的皖北乡村，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媒介的传播对当地村民的影响依然很有限。

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旨在揭示清朝的“传播体系”、“官僚机制”和“皇帝权力”之间的博弈问题。他认为，清朝的官僚机制试图通过操纵传播体系来控制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则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简言之，他探讨的其实就是乾隆时期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本书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此外笔者还将讨论近代的知识精英如何利用媒介传播西方思想观念，进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明。

到了2016年春夏之交，笔者开始付诸写作计划。其时，笔者在与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的一次访谈中，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何种学科会成为未来的“显学”？栗山教授稍作思索之后，说：“我认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比如，微信在中国就非常盛行，微信正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观念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以往的传播观念无法解释现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权势结构正在被‘分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栗山教授的这番话进一步坚定了笔者的研究计划。

哈罗德·伊尼斯曾经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新媒介技术的运用而造就了古代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代中国等帝国。在近代历史上，也因现代媒介的出现，而有了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在微信等自媒体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媒介而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然而，媒介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规范人们生活的观念和权力也将发生变革。这种由媒介技术变革引起的近代中国权力及人们思想观念变迁的图景，正是拙著所努力揭示的目标。

具体言之，拙著主要探讨如下内容。第一章讲述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以及晚清士人洪秀全、赵烈文、王韬等如何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而成为清朝科举文化系统中的“异类”，甚至成为清朝的“叛逆者”。此章还特别讨论了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如何因受到太平军战乱的影响，而不得不利用“周易占卜”来获取他想知道的信息，以解决因太平军战乱而造成的信息传播的苦恼。第二章，讲述洋务能臣盛宣怀如何依托晚清重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力体系”来构建晚清帝国的媒介网络，以及盛宣怀如何利用这一媒介网络对晚清政治外交施加影响。第三章探讨甲午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的晚清新派读书人如何受到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进而利用媒介来呼吁改革变法，促进晚清传播的政治化；同时，探讨康梁师徒以及孙中山如何利用现代媒介将海外华侨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植根于华侨社会的“海外之中国”，以服务其改良与革命的政治需要；此外，此章还探讨了庚子之后，清廷内部的“行在派”“清廉派”“北洋派”等政治派系如何利用“枪手”、“照相”和报纸等现代媒介技术进行政治斗争。第四章，主要围绕商务印书馆、著名记者黄远生来探讨民国初年的媒介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第五章，探讨蔡元培自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为了实施其“道德救国”的曲线救国理念，如何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一个传播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舆论平台，使得北京大学对现代中国政治的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六章，探讨“一战”时期的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并进而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这是关于“一战”时期境外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跨国案例。第七章，探讨五四运动时期，直系军阀吴佩孚如何利用电报等现代媒介来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这是关于北洋军阀与现代媒介及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的案例。

媒介技术的变迁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甚至会引发文明的变迁。正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言：“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上去，似乎是

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①如果本书能够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启迪，则幸莫大焉。

马建标

2018 年春于复旦大学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导言 1~2 页，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目 录

第一章 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	1
第一节 马礼逊：帝国边缘的陌生人	1
第二节 洪秀全：落魄文人的天国之梦	14
第三节 边缘士人：赵烈文与王韬的传播经历	33
第二章 盛宣怀与晚清媒介网络	56
第一节 “刺马案”与晚清媒介的国际化	57
第二节 心灵的延伸：盛宣怀和他的媒介网络	60
第三节 庚子国难与盛宣怀的媒介政治	67
第三章 晚清帝国传播的政治化	77
第一节 梁启超与晚清传播的政治化	77
第二节 孙中山、华侨和“海外中国”	90
第三节 “枪手”：丁未政潮中的媒介运用	102
第四节 袁世凯及其“洹上渔翁”形象的塑造	118
第四章 民国初年的媒介与政治	133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与政治	133
第二节 黄远生与民初媒介生态	150
第三节 血路：黄远生的自我超越	161
第五章 作为媒介的北京大学	165
第一节 声名狼藉：蔡元培主政前的“老北大”	167
第二节 唤醒青年：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意识	173

第三节 读书与救国的两难：蔡元培努力遏制北京大学的 政治参与	179
第六章 “一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185
第一节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5
第二节 “一战”之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10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224
第七章 权力、媒介和舆论	229
第一节 “爱国者”：吴佩孚的公共形象塑造	231
第二节 五四运动与吴佩孚的崛起	235
第三节 北战：直皖战争与权势转移	242
附录一 克服学术惰性：哈佛大学栗山教授访谈录	251
附录二 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清末民初国际宣传政策形成之 考察	257
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77

第一章 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

一个有趣的研究，就是追溯中国期刊文学与新闻业的起源和发展。像欧美的教育、科学和艺术一样，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始于基督教的影响。^①

——阿瑟·R. 加利莫尔

第一节 马礼逊：帝国边缘的陌生人

1800年，以重视新闻宣传而著称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选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当选，在美国新闻史上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美国“报业与国家的扩张”。换言之，新闻传播的好与坏，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尺度。因为，新闻的力量“不在于以观点去说服别人，它的力量在于传播消息，在于激起人们对迄今淹没于社会冷遇中的重要问题的关心”^②。对现代国家而言，传播的政治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消息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继而凝聚人心，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众新闻传播的国家，要指望其人民如何地爱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拿1800年的美国与清朝相比较，人们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变迁，是多么的隔膜。当时的中国仍自视为世界的中心，

① Arthur R. Gallimore, "Journalism and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Oct. 1, 1938, p. 520.

② [美]埃德温·埃默里、[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121～122页，苏金琥、张黎、阮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周边的部族如安南、暹罗等，不过是其朝贡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已。清朝的皇帝被尊称为“天子”，他们拥有天朝的发达文化，而外邦不过是蛮夷。对于这些蛮夷，天朝乐善好施，一无所求；这个古老的帝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由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主导的一个神秘的停滞的国家。^①但是，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南部边城——广州，自康熙时代以来就设立了十三行，允许西洋商人在此地从事贸易活动。^②清廷试图把西洋人对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这小小的十三行里头。这个十三行，在清廷看来，是中国与西洋蛮夷进行交往的一个“危险的前哨”。

由于贸易的需要，清廷才允许十三行在广州存在下去。但是，清廷对如何管理这些外侨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这些规章制度中，今人可以感受到，清廷对待洋人的态度是冷漠的、充满敌意的。任何外国人都不得进入广州城里，他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城郊一块狭小的地段，此即十三行所在地。这一地区紧靠珠江的北岸，其长度大约为四分之一英里。^③1798年，一位到访十三行的美国理查德·J. 克利夫兰(Richard J. Cleveland)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十三行的景象：

漂亮的房子，欧洲式的位于珠江之滨……它们通常是两层楼，下面一层作为堆栈。房屋粉刷得雪白，各国国旗挂在一根长旗杆上，飘扬于房顶之上……^④

① W. M. Ashomre, “An Itinerary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07-1897,”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Dec. 1, 1897, pp. 570-571.

② 关于广州十三行制度，通行的说法是，开始于1720年。详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16页，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③ 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

④ H. W. S. Cleveland, *Voyages of a Merchant Navigator of the Days that Are Pas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6, pp. 46-47. 另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20页，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但是，十三行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贸易活动的“前哨”，它绝不仅仅是中外商人为了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贸易而讨价还价的地方，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碰撞之地。对西方文明来说，十三行也是其进入东方文明的“前哨”。西洋人想要依靠这个“前哨”，千方百计地靠近中国，最终改变中国的文明。而这种改变，首先发端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活动。

一、“上帝的使者”：马礼逊与其传教士身份的形成

1807年9月7日，一位25岁的英国年轻人来到了广州十三行。一路问询之后，他找到了居住在美国商行的米诺(Milner)。米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并为他提供了住处。^①这位年轻人就是著名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按规定，马礼逊不可以在广州自由行动，他不能离开商行半步，也不能对中国人公开传播福音。很快，几个月过去了，他在商行里一无所成，郁闷至极。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成为商行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这令他自己和米诺都感到非常尴尬。无奈之下，马礼逊只能搬到一个货栈避难，他改换中国人的服装，学习中国人的起居习惯，从他的中国语言老师那里获取食物。与此同时，马礼逊夜以继日地学习汉语。他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传教，传教的对象则是他的仆人和汉语老师。在李十公和陈老宜等中国人的帮助下，马礼逊在广州十三行里一直忍气吞声地住到1808年6月1日，之后搬到澳门。在当年的6月27日，马礼逊完成了长达1100页的拉丁文与汉语辞典。^②

自然，人们要问：马礼逊究竟何许人也，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来到中国？这就需要从马礼逊的经历谈起。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莫佩思(Morpeth)，

①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 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ug. 1, 1834, p. 180.

② 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 Bridgman, “Dr. Morrison in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 1876, p. 174.

他本是苏格兰人的后裔。作为家中最小的男孩，马礼逊饱受父母的宠爱。在来中国的10年前，马礼逊还没有上帝的观念。大约15岁那年，马礼逊突然萌生了宗教观念，他开始阅读圣经，冥想和祈祷。在1798年，马礼逊加入了当地的苏格兰教会。从那时起，他的宗教信仰就越发地虔诚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制鞋匠，按理马礼逊长大后要子承父业，靠此为生。但是，强烈的宗教信仰让马礼逊意识到他的人生使命将是服务于社会，为他人谋幸福。尽管日常时间都用在劳动上，马礼逊还是挤出时间来读书，因为他知道要献身宗教事业，必须有知识。令他悲伤的是，他第一次请求当地牧师指导他的学习时，遭到了拒绝。幸运的是，在1801年，马礼逊得到了英国纽卡斯尔(New Castle)的牧师雷德罗(Laidler)的私下指导，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拉丁文。这门语言课的学习前后持续了14个月。^①

1803年，马礼逊的好运来了。这一年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伦敦北部的霍克斯顿神学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Hoxton)，在那里读了一年半书。此时，他终于宣布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夙愿，“我要成为一名传教士”。这一愿望一直在马礼逊的心头萦绕，他曾对身边的朋友诉说，得到的答复是老实地留在这里，哪里也别去。听说马礼逊要当传教士，他的父亲哭泣了。父亲为他深爱的小儿子马礼逊祈祷，不希望他离开，担心他在离开后会犯错误。但是在母亲去世之后，马礼逊当传教士的主张终于获得了父亲的支持。1804年，马礼逊终于加入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时年22岁，来到位于戈斯波特(Gosport)的传教学院培训。在那里，神学造诣精深的戴维·博格(David Bogue)担任他的导师，一直到1807年1月他被任命为来华传教士。^②

①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 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ug. 1, 1834, pp. 177-179. 关于马礼逊早期之历史，参见[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27~60页，王振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英]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1~55页，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 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ug. 1, 1834, p. 179.